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- ▶ 裡裡外外：評史景遷《前朝夢憶：張岱的浮華與蒼涼》及卜正民《維梅爾的帽子：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》

Internal Happenings and External Connections: A Review of Jonathan D. Spence's *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: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* and Timothy Brook's *Vermeer's Hat: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*

doi:10.6752/JCS.200903_(8).0012

文化研究, (8), 2009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8), 2009

作者/Author：陳國棟(Kuo-Tung Chen)

頁數/Page：220-229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09/03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0903_\(8\).0012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0903_(8).0012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書評

《文化研究》第八期（2009年春季）：220-229

裡裡外外：評史景遷《前朝夢憶：張岱的浮華與蒼涼》及卜正民《維梅爾的帽子：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》

**Internal Happenings and External Connections:
A Review of Jonathan D. Spence's *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: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* and Timothy Brook's *Vermeer's Hat: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***

史景遷(Jonathan D. Spence)著，溫洽溢譯。2009。《前朝夢憶：張岱的浮華與蒼涼》(*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: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*)。台北：時報文化。ISBN：9789571349886，260頁。

卜正民(Timothy Brook)著，黃中憲譯。2009。《維梅爾的帽子：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》(*Vermeer's Hat: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*)。台北：遠流。ISBN：9789573264521，320頁。

陳國棟

Kuo-Tung Chen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

史景遷的《前朝夢憶：張岱的浮華與蒼涼》（後簡稱為《前朝夢憶》）一書寫張岱。張岱的生平饒有趣味。他本人生活於兩個朝代，在兩個朝代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：明末時，他享受人生，極盡逸樂之能事；清朝時，他卻生活儉樸，並且致力於記錄往事，也致力於嚴謹的歷史撰述工作。

張岱的作品，很晚才被流傳。除了在世時已經出版的《古今義烈傳》外，也只有《西湖夢尋》在康熙年間(1662-1722)出版過。其他

要到19世紀中葉才陸續印行。收錄家傳的《瑯嬛文集》直到光緒三年(1877)始得刊出，則已經又是一個朝代的末期了。這些稿本，保存不易，沒有遭毀，可以說是運氣。20世紀中葉以來，在台灣比較多人閱讀的是《陶庵夢憶》，主要是因為這本薄薄的小書所收錄的散文，文體雅緻，並且也饒富趣味。

張岱在生活於明代時便已開始寫作，但是大部分的作品卻都寫在明亡以後。他在艱困的生活條件下追憶往昔，傳遞的卻是美好、溫馨的回憶，很少是呼天搶地的悔恨或抱怨之作，這是他的小品文引人入勝的地方。憶舊當然是他的寫作方向之一，另一個方向則是撰寫歷史。史景遷穩穩地掌握到這兩個層面，以現代人可以了解的方式，不加太多的評論，利用張岱自己提供的素材，將他的生平與著述，娓娓縷述，讀來令人感到輕鬆、愉悅。

以歷史或人物傳記為內容的書，在不同的時代，通常都要經過改寫或重寫，才能讓一般讀者容易走入書中的時代，在陌生的場景中感覺到一分熟稔與親切。改寫或重寫歷史書的工作，至少要包括三個方向的努力：首先要理出一個有理可循的敘事架構；其次是要對所使用的資料做好疏解，讓讀者不要受困於文字；再來則是敘事中涉及的掌故也要稍作說明。現代人讀書的方向與古人不同，有些典故對讀者已然陌生。若是遇到以史料出現當時的新聞當背景的故事，不經說明，現代讀者根本無法進入狀況。做到前述三點不必然能寫出好書，好書倒不能不照顧到這方面的需求。《前朝夢憶》一書大致都滿足了這些要件，而中譯本也妥當地傳述了原意。讀《前朝夢憶》，其實比讀張岱的任何一本著作來得更舒適，更容易體會張岱寫作時的心意。

本書優點很多，讀者看了便能心領神會。個人只能表示一點讀書心得，以就教於高明而已。

張岱的〈自為墓誌銘〉有「茶淫橘虐」一句，應該就是喝太多的茶、吃過多的橘子，本書卻解為「圍棋」。(頁235)張岱本人曾經沉迷於飲茶，「茶淫」不成問題；「橘虐」其實是季叔張燁芳的事跡(頁156-157)，但張岱拿來當成自己分享家族成員任性縱慾的一面，其實也還不算離譜。

張岱在〈石匱書自序〉中說：「有明一代國史失誣、家史失諛、野史失臆」。這句話可以說是他最常被引用的警句。頁244的原註說：筆者（史景遷）把「國史」譯為「political history」、「家史」譯為「family history」，「野史」譯為「untamed」。我個人不完全同意。其實，「國史」應是指官修歷史，包括前朝「實錄」與經常性編纂的「列傳」之類，其內容並不限於政治史。不過，國史由執政者修纂，政治鬥爭勝利、取得執政權的一方，在撰寫被他們打敗的一群人參與過的歷史時，經常刻意加以扭曲，所以會有誣枉的毛病。「家史」可以說是自家人寫自家的歷史，為長者諱，不寫長輩的缺點或過失，也不算錯。但過度擴大傳主的成就或優點，藉以自我彰顯，則有吹牛自誇的嫌疑。不過，即使再怎麼「失諛」，也還是有一定的價值，如同現代流行「口述歷史」，受訪者（傳主）極少自暴其短，但研究者還是可以參考其他資料，經過比對與研判，找出相對可靠的真相。「野史」廣義地說可以包括所有私人撰述的歷史記述，但狹義而言，並不包括態度嚴謹的作品。明朝文人喜歡寫作，而且不求精確，因此可以歸類為野史的作品很多。清初著名的史學家全祖望相當討厭野史，他說：「野史之難信有二，彭仲謀流寇志，譌錯十五出於傳聞，是君子之過；鄒流綺則有心淆亂黑白，是小人之過。其餘可以類推。」（《鮑琦亭集》，〈繭菴（林時對）逸事狀略〉）也就是說態度不佳或學養不足，寫出來的東西就是不好的野史。

無論如何，對後世的撰述者而言，「國史」、「家史」、「野史」這三種「史」其實都是某種史料，雖然有缺陷，但比沒有好。歷史其實可以有第四種，就是在國史、家史與野史之外，加入研究撰述，特別是指方法與態度都正確的撰述。

張岱寫了不少家人的傳記，而且寫作的方向與當時「家史失諛」的作法大不相同，可以說是別開生面。張岱所編撰的《石匱書》，是個人著作，屬於撰述的一類；他雖然為國家人民寫國家的歷史，但是《石匱書》不能算是一種國史。籠統而言，《石匱書》也是一種私家撰述的「野史」。不過，《石匱書》雖然是張岱個人的私人撰述，但是費心考訂，用心撰寫，力圖持平，講求依據，其實也不能當成是道聽途說的「野史」，而應視為一種嚴謹的著作。

張岱強烈的歷史感讓他覺得要傳世。一則是家族成員、好友的個人歷史（亦即這些人的傳記）；一則是國家的歷史（他對地方歷史著墨無多）。後者他開始得早——《石匱書》早在崇禎紀元伊始（1628）就已構思，目的在撰寫大明開國以迄天啓一朝的歷史。傳記的部分好像在明亡後才開始；明亡後也開始著手寫崇禎朝及南明的歷史，以成《石匱書後集》。儘管他對50歲明亡以前的人生有所自責，但他仍力圖保存那段時間的個人記憶與個人的作品。

明亡，張岱不必像某些士大夫那樣，以自殺殉國，因為他未曾出仕。黃宗羲就說：「嗟乎！亡國之戚，何代無之。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；陟北山而不憂父母；感陰雨而不念故夫；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；是無人心矣。故遺民者，天地之元氣也。然士各有分。朝不坐、宴不與，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。」（《南雷文定》，〈謝時符先生墓誌銘〉）說是人多少要有感情，要能懷舊；至於在前朝未曾出仕過的士人，唯一的義務是不要在本朝出仕，那就盡到讀書人的本分了。這大致也代表當時的主流意見。所以明朝滅亡，張岱完全不必考慮自殺殉國。但是明朝亡國，畢竟給他和他的家族帶來翻天覆地的大轉變，他得考慮再活下去有何意義？他自己說，撰述歷史是他繼續存在的理由，這當然是指《石匱書》和《石匱書後集》的編寫工作了。那麼，《石匱書》及後集是否達到張岱的目的呢？谷應泰從張岱的努力得到輕易完成《明史記事本末》的好處，張岱介意嗎？當然，張岱可能換到生活資源、得到檢視崇禎邸報的機會，有助於他自己的《石匱書後集》的編著，或許應該認為公平、值得吧。

史景遷寫張岱，設定的讀者應該是英語世界的讀書人，按照他們的理解習慣去寫作。譯成中文時，當然是訴諸華人讀者。本來史景遷已經把張岱自己的文字譯成當代英文，也就是一種白話文了，英文讀者索解不難。可是在回譯成中文時，有時候爲了更貼近時代的感覺，因此直接用張岱的文字來置換。溫洽溢先生大概也就這麼處理，有原文的，一律逕抄原文。這樣一來，卻也產生了一些小缺點，那就是白話文又變回文言文，現代著作又變成古書，讀者又受困於文字了。再者，直接把古文抄進來，不針對原文的意思花點力氣，也表現在直

接置換張岱原文時，不克做好校對的工作。例如頁136「樑上群鼠白紙」其實是「樑上群鼠曳紙」，也就是屋樑上有好幾隻老鼠在撕拉紙張的意思。「南京鐘山」（頁165）正寫為「南京鍾山」；「赦免其罪」（頁134）應作「赦免其罪」。「解甲歸農，賣刀賣犢」（頁172）其實是「解甲歸農，賣刀買犢」，賣了刀，買牛來耕田，改行務農，不再打仗。頁185和頁188好幾處都把「江干」寫成「江千」，意思就不通了。應該寫成代表江邊之意的「江干」兩個字才對。

校對時，順讀其實很重要。頁233，「魯王……於順治十六年死於金門島」，「順治十六年」應該改為「永曆十六年」。「順治十六年」為1659；「永曆十六年」為1662。魯王實際上死於1662年。譯本於「死於金門島」下緊接著說「一年後，即康熙二年（一六六三年）」。校讀時若稍加留意，應該會發現以上的錯誤。至於頁93將「1620年代中」譯成「萬曆五十年前後」，十分不妥。明神宗在萬曆四十八年(1620)去世，因此萬曆年號不會有四十九、五十年。

譯者偶爾貼心，做了些必要的疏解，用白話文把比較難懂的文字重述一遍。如在「厲之人」之後以括弧說明是「癡瘋病人」（頁205），對讀者就極有幫助。可惜頗多地方該做卻沒做。要不然就是有時候不小心，反倒畫蛇添足。例如頁143「譯按：史景遷原文作廣西巡撫，但其所引之書稱許芳谷為『粵巡撫』」，於是譯者便將許芳谷的官銜從廣西巡撫改為廣東巡撫。其實「粵」兼指廣東及廣西，而當時的制度是兩廣設總督，駐在廣東；廣東不再專設巡撫，而廣西則另設一名巡撫。因此「粵撫」只有一位，而且就是「廣西巡撫」。然而依據吳廷燮的《明督撫年表》，崇禎三年時的廣西巡撫實際上是一位名叫謝如蘭的安徽合肥人，字相畹，不是許芳谷。這其實是張岱的狡獪，而作者及譯者都沒有留意。「許芳谷」與「謝如蘭」兩個名字在字面上有太多相同的因子（姓氏都有言字旁，名字都和芳草有關），而張岱明白指出崇禎三年以及「粵撫」字樣，顯然雖不欲直指這位行賄者的姓名，但又不想讓真相無從查考，因此故意留下線索。史景遷將「粵撫」解為「廣西巡撫」實在很正確，只是他沒有進一步指出「許芳谷」這個名字被張岱變造過！附帶一言：頁178說「祁彪

佳官做到蘇松府巡按」，官銜多了一個「府」字！

本書頁221-222說崇禎朝的《邸報》是崇禎朝國史的草稿，過於勉強。《邸報》原本的功能是提供朝議、政令的內容，當然可以作為國史的素材，但即使蒐羅於一處，在未經整理、編寫之前，也只能說是一堆史料，而不能說是「國史的草稿」。

*

*

*

卜正民的《維梅爾的帽子：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》（後簡稱為《維梅爾的帽子》）一書，書名副標題英文原文「*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*」的意思是「17世紀與全球性世界的發端」。中文版改成「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」，反倒失去準頭。在第一章內文，作者卜正民自己不就已明白地說「本書鎖定七幅畫來探討」嗎？七幅畫作當中，只有五幅是維梅爾的作品；剩下的兩件之一其實是一個瓷盤上的裝飾畫，再有一件則是另一名荷蘭畫家的油畫。

本書以維梅爾的畫作和另兩件作品連結17世紀的荷蘭與世界，同時又聚焦於中國。維梅爾的畫作與敘述的故事之間，未必存在著實然的關係，往往只是可能，或者應該如此。但這無妨。維梅爾的畫是作為起頭用的楔子，引人入勝的楔子。在本書中，荷蘭代表17世紀的歐洲，與中國發生接觸。但接觸的內容，不但受到歐洲與中國自身歷史進程的影響，事實上很多相關的逸事、逸聞，發生的場景既不在歐洲，也不在中國，而是在世界其他的角落。這些發生於歐洲與中國之外的故事被巧妙地帶進來作為橋段，作為過場的一齣齣小戲。也因為場景不限於歐洲與中國，所以稱得上是「全球性世界的發端」。

許多撰寫書評的人都讚揚卜正民能從維梅爾那些尺寸不大的畫作中，看出一個朝向全球化(globalization)方向轉變的世界，認為是他的慧眼獨到。個人也有同感。好比說同樣針對維梅爾的〈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〉這幅畫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李春，在《歐洲十七世紀美術》一書中只簡單地說：「這種室內畫沒有多少故事可講，反映的是荷蘭人日常極普通的生活場面。」可是卜正民卻在本書

的第三章帶給讀者細密的觀察與分析，並且作為一個話頭，帶出17世紀歐洲人的海外爭奪、帶出「白獅號」的沉船故事，更帶出了一種17世紀最重要的國際商品——中國瓷器。

本書的主題其實是：透過歐洲人的海外發展，近代世界開始走向全球化，整個地球開始朝形成一個「全球性世界」加速邁進。當然，作者卜正民並沒有忘記，我們本來就只有一個地球，承受共同的天文、地理條件。因此在劈頭的第一章就借用〈台夫特的一景〉引出影響17世紀歷史最深的因素——全球降溫。卜正民認為這個降溫期發生在1550-1700年之間。不過，依據1985年施堅雅(G. William Skinner)在就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時的演講，這一波冷氣候其實是發生在1645-1715年之間，所以有人把它叫作「路易十四小冰期」(little ice age of Louis XIV)，因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在位期就發生在1643-1715年之間。同一段時間為中國的清朝順治(1644-1661)與康熙(1662-1722)時代。卜正民談到氣候降溫對全球的影響，在中國的部分舉了一些實例。我個人也想加進來一個在地的例子。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八月間，施琅到台灣接受鄭克塽的投降。三個月後，他返回大陸。在他離台前，台灣府城（今台南市）竟然下起大雪。由蔣毓英編輯的第一本《臺灣府志》記下這一年「冬十一月，雨雪。是夜，冰堅厚寸餘。從來臺灣無雪無冰，此異事也。」稍後幾年，高拱乾在新一版的《臺灣府志》中更寫道：「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冬，始雨雪，冰堅厚寸餘。臺土氣熱，從無霜雪。是歲八月，甫入版圖，運屬一統；地氣自北而南，此其兆也。」無獨有偶，這一個冬天，緯度比台南更南的廣州也下雪。次年，著名的廣東詩人屈大均特別寫了一首詩，說是「邊人帶得冷南來，今歲梅花春始開。白頭老人不識雪，驚看白了越王臺。」位處熱帶的台南和廣州都在同一年冬天下雪，高拱乾與屈大均都說是來自北方的滿洲人入主中國，寒氣南逼，因此下雪。不知道其實是全球氣候變遷所致。

氣候變遷的道理或許一時不解，但是歐洲人殖民與貿易活動帶來的衝擊倒是比較容易被體認——雖然多數人的感受還不夠深刻。無論如何，一旦開始，影響便既深且遠。作者提到了歐洲人對皮草（寒

帶動物皮毛)的需求促成了加拿大的開發，其實他也可以用同樣的眼光來看待西伯利亞的歷史。因為同樣的目的，使得俄羅斯人在莫斯科大公國的領導之下，從東歐東進，在1585-1605年間，到了鄂畢河，1628年到了葉尼塞河及其支流，1630年到了勒那河，1640年代到了黑龍江流域，1650年代則到了整個貝加爾湖地區，而在1653年，建立了尼布楚城，與中國發生了邊界衝突。穿著皮草可以視為一種時尚，但氣候降溫無疑也是造成皮草大量消費的一大動力。

或許，皮草可能只對寒帶、溫帶的居民影響比較顯著，但是《維梅爾的帽子》這本書所敘述的其他商品——香辛料、瓷器、絲綢、煙草、茶、糖、咖啡、白銀——的流通，卻改變了全球人類的生活內容。這些商品原本只由特定的民族使用，稱得上是「文化性商品」(cultural commodities)，可是在歐洲人帶動的世界貿易網絡出現後，被引介到不同的地域，透過「文化移轉」(transculturation)，被不同的民族普遍接受。全世界的人使用這些商品的程度，乃至於使用的方式，也許不盡相同，但是大家都不能無視於其存在，這當然是「全球化」的起步。

《維梅爾的帽子》寫得很好，譯得也不錯，甚至於有些「文勝於質」。就目前的形式看來，它並不是一本學術著作，訴求的對象也是一般的讀者。它的文本做到生動活潑，令人感動，並且清楚闡釋了主要的理念，毋寧是一部十分成功的作品。

正因為訴求的讀者群廣泛，不擬用繁瑣的學院式註解交待資料來源，因此對於想要進一步探尋下去的讀者或許有些遺憾。對於好學深思的讀者，個人願意指出：卜正民所選用的歷史掌故，其實在過去20、30年間都是國際學術、文化界的大事，而在網路世界就可以找到豐富的參考文獻或者進一步的訊息。例如從「白獅號」打撈到的出水文物就引起學術界、古董商、收藏家等人的關心，並且也有專書出版。又如第四章介紹在1625年自馬尼拉前往澳門，遭風飄至廣東潮州的西班牙籍耶穌會士拉斯科特斯(Adriano de las Cortes)，卜正民說他的旅行紀錄手稿一直保存在大英圖書館。其實，從網頁上就可以追索到該書已經於1991年先以西班牙文在馬德里出版(B. Moncó ed., *Viaje de*

la China)；2001年再由Pascale Girard譯成法文，在巴黎出版(*Le Voyage en Chine d'Adriano de las Cortes, S.J. (1625)*)。讀者要是能讀西班牙文或法文，便可買一本在家中詳加披覽。同樣地，1653年荷蘭船「雀鷹號」(the Sparrow Hawk；荷蘭文稱作*de Sperwer*)漂流到韓國濟州島、船員被迫在韓國滯留13年的事情，在這批人逃離韓國回到歐洲之後，就已出版了他們的歷險記，並且翻譯成多種文字。2002年，慶祝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400年，許多國家都參與相關活動。韓國也參加，並且也把這個故事發展成爲濟州島的觀光賣點之一。網路中，有好幾個資訊豐富的網頁可以參考。這艘船在失事之前，載了一位名叫卡撒爾(Cornelis Caesar)的荷蘭人到台灣就任長官(governor)之職，而該船係在隨後被派往日本的途中失事。這個事實也正說明了在17世紀的國際歷史事件中，台灣並沒有完全置身事外。

《維梅爾的帽子》這本書處理了相當多的歷史事件，不免借重許多文獻。因爲不可能做到細密的研究，史實的掌握也難免有些出入。例如對1603年馬尼拉西班牙人屠殺兩萬多名華人的來龍去脈，錯誤的地方就相當嚴重。又如講到1628年明朝暫時又實施海禁是爲了對付荷蘭人，其實也不對，當時是爲了對付鄭芝龍。讀者若能就其大處著眼，還是可以認定全書敘事大抵八九不離十，還是本值得閱讀的好書。

稍早我們已經提過翻譯的工作基本上做得不錯。不過還是有可以改進之處。例如說譯文所謂拉斯科特斯在潮州看到的十八座「儀式用石拱」，更好的譯法應該是「牌坊」；又如在講馬尼拉大屠殺事件時，一方面說1630年(原書文字)左右，每年有十萬名福建人出海，又說是「三十至四十艘人稱junk的中國式帆船」擔當載運的工作，商品之外，平均每艘船乘載了2,500人以上，這不是當時的中國帆船所能勝任的，也不是馬尼拉當局所能接受的入港人數。相關數據恐怕有問題。鯡魚的英文是「herring」，不是「ferring」；至於把明穆宗即位的那一年(其實是第二年，當年才改元)寫作1667年，顯然也是「手民之誤」，應該改作1567年(隆慶元年)，這一年明朝開放漳州月港給國人出海貿易，改變了兩百年來的海禁政策。譯、校都很辛苦，不過讀者有權期待，將來也許可以再多費心。

*

*

*

史景遷的《前朝夢憶》雖然在〈浪跡天涯絕塵寰〉一章的末尾提及天主教、利瑪竇等西洋史事，不過那只是全書的枝節。史景遷所致力呈現的張岱：他的身心完全屬於中國，他的個人歷史與他所置身的時代背景，反映的是17世紀中國的內在發展。

至於卜正民的《維梅爾的帽子》著力的方向則在闡明，17世紀的中國已經不能自外於世界，無論是人員、觀念或者是物質文化，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都已展開直接或間接的交互影響。

這兩本書，除了都聚焦於17世紀外、都聚焦於中國外，似乎一者偏重中國的內在發展，一者偏重中國與外在世界的互動。其實，我們也可以這麼想：《維梅爾的帽子》是個楔子，《前朝夢憶》也是個引子。兩本書都是讀者自行進一步追索的敲門磚。當讀者讀到《陶庵夢憶》描寫明成祖所造的南京大報恩塔，說它是「中國之大古董，永樂之大窯器」時，也許要讚嘆其建築設計與工藝的巧妙，佩服其預製備份瓷磚、隨時依需要取用修補的睿智。其實，這座西方人稱為「南京瓷塔」或「中國瓷塔」的建築物，隨著清初荷蘭人的朝貢、乾隆時馬戛爾尼(George Macartney)的出使，與鴉片戰爭時英軍的占領，早將它的形象透過版畫在歐洲流傳。張岱筆下的報恩塔，正是中西互動火花「中國風尚」(*chinoiserie*)的代表性符號！

史景遷與卜正民兩位作者藉由其廣博的知識、活潑的想像力與聯想力、生動而細膩的布局，加上流暢的文筆，把17世紀歷史的面向帶到讀者眼前。他們最大的貢獻是提煉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，以適合大眾閱讀的方式和廣大的讀者們分享知識的進步。國內的學術環境不容許國人自己寫出這樣的作品，但是透過譯作，也算是一種與世界接軌！